中国式现代化外部环境的理性分析与策略选择

徐德顺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北京 100710）

摘　要：中国式现代化是开放的巨系统工程，置身于全球大环境乃至宇宙之中，受到来自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外部因素的正负反馈影响。中国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一方面，要适应纷繁复杂的外部环境，抓住机遇，发展自我；另一方面，要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推动外部环境朝着符合包括中国在内最广泛国家利益方向发展。基于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本文选择从自然资源、地缘政治、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货币金融五个方面，在对中国式现代化外部环境进行理性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策略建议。具体包括：减少自然环境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增强关键矿产战略自主与国际合作；重视周边安全稳定，扩大对外人文交流；从容应对美欧所谓的“不公平贸易”，加速构建基于“双循环”的中国新发展格局；在努力改善中美、中欧投资关系的同时，提升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过程中全要素生产效率；理性调整中国货币金融策略，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合理和有利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外部环境；理性分析；策略选择
中图分类号：F124；D8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5559-（2025）03-0005-14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式现代化”是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提出的重要论断。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就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全面部署，提出“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营造良好外部环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自主选择的道路，是中国领导人审时度势的决策和集体智慧的结晶。中国式现代化是开放的巨系统工程，置身于全球大环境乃至宇宙之中，中国不断与中国外部交换物质、能量和信息。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外部环境相互联系，互为反馈。

中国式现代化正面临加速演进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外部环境。以日本宣布投降（1945年8月15日）为“二战”结束标志，迄今（2025年）已80周年。“二战”末期，以美国为主的三极力量召开的雅尔塔会议（1945年），以及一系列会议包括敦巴顿会议（1944年）、联合国制宪会议（1945年）、布雷顿森林会议（1944年）等，主导确定的战后世界格局和政治经济秩序，如今面临再调整再平衡。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且由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多极力量形成和持续分化，以及诸如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奇异吸引子”的出现，加速了这个“大变局”的演变进程。

中国需要理性看待中国式现代化外部环境，需要认清当前及未来三十年是中国式现代化重要窗口期。首先，中国是发展中大国，是“全球南方”重要一员。中国国家统计局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4年，中国GDP总额为1 349 084亿元，折合约18.94万亿美元，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约占美国GDP总额29.18亿美元（美国经济分析署统计）的64.91%。2024年中国人均GDP为95 749元，约合1.35万美元，远低于美国人均GDP（8万多美元）水平，也低于发达国家的最低标准（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数据显示，以“预期寿命、预期受教育年限、平均受教育年限、人均国民收入（GNI）”为基础变量的人类发展指数（HDI），2023年的中国得分为0.788，在全球排名中列第75位，而排名前三十的国家和地区HDI得分均在0.9以上。其次，中国的发展任务重、时间紧。中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到二〇三五

作者简介：徐德顺（1966—），男，研究员，博士，博士生导师，本刊编委，主要从事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研究。

年，也就是说10年后，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也就是说到新中国建国100年左右、未来30年左右，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因此，为实现强国目标，当前及未来三十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重要窗口期。而要顺利完成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任务，必然离不开良好的外部环境支撑。所以，中国需要理性看待中国式现代化的外部环境，一方面，要适应纷繁复杂的外部环境，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修正自我，发展自我；另一方面，要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推动外部环境朝着有利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最广泛国家利益方向发展，为全球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积极因素，努力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基于以上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本文主要应用复杂系统思想，以定性分析为主方式，系统观察复杂的中国式现代化外部环境，并提出相关策略建议。“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1]，系统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外部环境，涉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乃至国际政治学、军事战略学等多学科知识，具体包括但不限于：有效配置有限的自然资源，既重视自然环境又重视社会环境，强调自然与人、人与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和谐发展等[2]。本文遵循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大类别，重点观察涵盖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社会环境，并进一步重点观察包括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货币金融在内的经济环境。本文不求面面俱到，拟重点从自然资源、地缘政治、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货币金融环境五个方面展开学理分析。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外部环境分类，如下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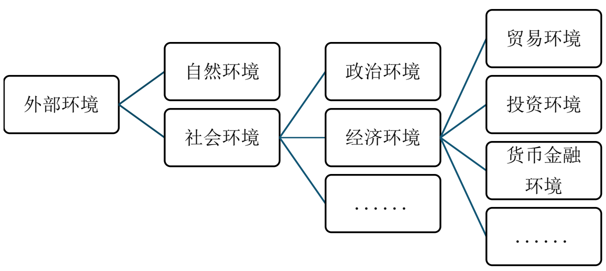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式现代化外部环境类别

二、自然环境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与应对

（一）自然资源是中国式现代化必需的物质条件

自然资源的概念形成与认知水平，至今仍在不断发展与完善中[3]。《中国资源科学百科全书》根据空间分布，将自然资源划分为陆地资源与海洋资源，其中，陆地资源又被划分为气候、土地、矿产、水和生物资源。

自然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必需物质条件，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离不开自然资源的支撑。1973年成立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致力于促进全球资源的合理利用并推动全球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中国自1973年以来一直是UNEP理事会成员。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逐步获得国际共识。

（二）自然环境恶化对中国式现代化构成物质威胁

地球乃至宇宙间的自然资源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中国陆地与海洋资源的直接受损，以及中国本土之外的自然资源受损的外溢效应，必然影响到包括中国在内发展的自然条件。毋庸置疑，自然环境的恶化将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构成物质威胁。

当下自然环境恶化带来的威胁包括但不限于：①人类无节制地开采矿产资源、林草资源、水流资源等，导致地球环境承载力不堪重负。联合国宣布，世界人口在2022年11月15日这天达到了80亿。超过80亿人口的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和一个世界，需要共同珍惜地球环境的承载能力。②人类无约束的太空探索或会引来“外来文明”。被誉为天才的加拿大籍好莱坞导演詹姆斯•卡梅隆2009年执导的科幻电影《阿凡达》所表达的发生在2154年的故事，值得人类警示。③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分索取或对自然资源平衡的破坏，受到地震、海啸、疫情、气温升高、厄尔尼诺等难以抗拒的自然现象报复。如，2023年的巴拿马运河严重干旱导致过航的船只减少，影响国际物流和国际贸易。④2025年1月20日美国新当选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宣布美国再次退出世界卫生组织、退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给人类共同应对疫情和气候变化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

（三）努力减少自然环境恶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负面影响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国应持续推进绿色发展。超越人类主观的自然力量客观存在，人类需要敬畏自然，包括敬

畏人类未知的地球之外的宇宙力量。人类需要采取有效措施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实现成本可控的能源转型升级，和平探索太空，共同应对来自自然资源和地球环境的各类挑战。为此，中国应持续推进绿色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义务，遵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发挥积极作用，减少美国不负责任“退群”带来的负面影响，促进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可持续，让世界读懂“美丽中国”。

中国应减少自然环境恶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负面影响，增强关键矿产战略自主与国际合作。持续构建可再生能源体系，重视矿产资源等自然条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支撑作用，尤其是在高端制造业、智能制造业和先进制造业领域，防止关键原材料供应短缺。关注2025年美国与乌克兰签署的《矿产协议》的外溢效应。建立国内开采、海外开发、国际贸易、战略储备“四位一体”的关键矿产供应保障体系。完善关键矿产对外出口管制，对国内优势关键矿产避免廉价出口。警惕资源民族主义倾向抬升和对外资源获取的不确定性，维护中国海外权益矿的产业经营和安全管理。与矿产资源丰富的第三国建立可持续和负责任的战略伙伴关系，推进包括中俄、中非、中拉在内的矿产资源国际合作。加强中国关键矿产供应链尽责管理能力建设，自觉抵制“冲突矿产”，提升关键矿产企业在ESG方面的服务和管理水平。争取关键矿产国际定价的主动权，提升中国在全球关键矿产领域治理规则话语权[4]。

三、地缘政治环境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与应对

（一）地缘政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影响因素

政治与经济关系是辩证统一的，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地缘政治是地理政治学的一个概念，原指地理因素对国家政治行为的影响，现泛化为国家间的政治、外交、军事乃至经济等在内的综合竞争与合作，以及由此带来的区域和全球权力格局的变化。

地缘政治环境指由地理因素、政治格局和国际关系等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特定区域内的政治环境。地缘政治环境的不确定性受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的影响，而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主要源于突发事件的发生[5]。显然，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孤立于中国范围内的封闭的经济行为，而是与中国所处的包括周边安全、中美竞争等在内的地缘政治环境密切相关。地缘政治因素尤其是一些严重的突发事件，深度影响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二）地缘政治环境对中国式现代化影响明显

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缘于复杂的政治经济军事关系。从历史长周期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战”（1914—1918）和“二战”（1939—1945）爆发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后（19世纪中期）大国的生产力和工业、科技、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一定程度上世界陷入了“金德尔伯克陷阱”。但从历史短周期看，有时是政治决定经济。“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几乎毫无疑问，但历史上“英雄人物”的意志可以改写历史。经济、政治、外交、军事四者概念之间或有重叠，也就是说，存在统计学层面上的“多重共线性”，尤其表现在政治和外交之间。其相互间关系可概括为：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表现了经济；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军事是政治的手段；战争是政治和外交的极端手段和最后手段；“战争是政治的继续”(1)；“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2)；“政治就是妥协的艺术”(3)。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地缘政治环境复杂多变，缘于复杂的政治经济军事关系。如：“华约”于1991年解散后，“北约”并未收缩，而是不断扩张，甚至试图打造“印太版北约”，或是罪魁祸首。

中国周边安全稳定对中国式现代化影响大。环顾1840年以来的近代史，中国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抗日战争等6次战争，受尽了列强欺侮。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抗美援朝、中印边境自卫反击、珍宝岛自卫反击、中越边境自卫反击等10余场局部战争或军事冲突，均与周边相关。对中国而言，“周边稳，则中国稳”。中国陆地边界线2.2万多千米、海岸线3.2万多千米，邻陆国家14个、邻海国家6个，其中南海、中印边境、朝鲜半岛等属于热点地区。如考虑经济意义上的邻国，还可以包括泰国、柬埔寨、新加坡、斯里兰卡、孟加拉国、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7国[6]。外部势力常与周边反华力量勾结，威胁中国安全。2024年6月，国内某权威媒体报道，美国在全球有

800多个军事基地，其中有300多个在中国周边地区。一言以蔽之，中国周边的安全稳定状况，直接影响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中美战略竞争对中国式现代化影响大。一是从“巴统”到“瓦协”，可见美国从未放弃挤压中国。新中国成立之初，就遭遇了由美国于1948年发起、由17个成员国于1949年成立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关于军民两用商品和技术清单、军品清单的出口管制。朝鲜战争期间（1950—1953），美西方更是对中国的出口管制达到了极致。著名的“米胶协定”于1952年签署和执行，是新中国打破“封锁”“禁运”的标志性事件。1991年苏联解体后，“巴统”于1994年解散，但随之而来的1996年“瓦森纳协定”行使“巴统”之职能，成员国由1996年包括“巴统”17国在内的33个国家扩展到包括俄罗斯在内的42个国家，2017年印度成为第42个成员国。“瓦协”虽存在变数，尤其是俄罗斯不会完全听命于美国的主导，但目前对中国的出口管制依旧。二是从美国SEC“中概股”规定，再见一斑。2020年12月，美国证监会（SEC）修订了《2002年公众公司会计改革和投资者保护法案》，出台了《外国公司问责法》。SEC要求，“中概股”企业证明其不为中国政府实体所拥有或控制，披露上市公司及其运营实体的董事会中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姓名，披露上市公司的章程和组织文件中是否包含中国共产党党章内容。SEC这一做法，带有明显的政治偏见和傲慢。三是特朗普重返白宫后，中美战略竞争或加剧。拜登2021年上任后，精心策划了所谓的民主峰会，已经召开了三届（2021、2023、2024），实质利用地缘政治影响力拉拢美国盟友及其伙伴，企图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孤立中国和俄罗斯等。2025年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基本延续了拜登反华制华政策，中美战略竞争或有所加剧。持续不断的中美战略竞争，无疑会影响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三）努力消除地缘政治环境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不利干扰

1.认清动态变化的地缘政治环境，减少中国式现代化的外部阻力

认清美西方反华反共势力尚存。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与美西方也曾有过友好合作期。比如，美国总统卡特执政时期签署《中国和美国科技合作协定》（1979），法国总统希拉克在任期间（1995—2007）促成中法两国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1997）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04）等。然而，不容否认，美西方长期以来有一些反华仇华、反共仇共者。为此，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需要做好长期“应战”准备，事实上也一直在“应战”。例如，2024年12月10日正式生效的所谓的“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议，就严重违背美方做出的仅与台保持非官方关系的承诺，中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4]。

认清目前的“东风”与“西风”力量在较量和动态融合中。一方面，“东风”力量在增强。俄罗斯主导的“集安组织”[5]力量尚存，包括中俄在内的上合组织（截至2025年5月有10个成员国）、金砖国家（截至2025年5月有10个成员国）力量在壮大，以及“全球南方”力量在加强。据报道，扩员后的“大金砖”在全球GDP占比，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从31.6%提高到35.6%，已经超过七国集团对世界GDP的贡献（30.3%）[6]。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风”势力仍过于强大，尤其在教育、科技、金融、军事等方面。当下的美国可深度影响全球约三分之一国家和全球约三分之二的GDP。有着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美英是铁杆兄弟联盟，还有“五眼联盟”（美英加澳新）、“奥库斯”三方联盟（AUKUS，美英澳）、美日澳印“四边机制”联盟（QUAD）、美日韩“三边”同盟、西方七国（美英法德日意加）、“北约”（32个成员国），以及美国的盟友（据不完全统计有68个）、英联邦国家（56个）等。出于历史渊源和所谓的共同利益，这些国家或地区在关键时刻遇到关键事件可能会“抱团”。基于以上两方面的力量或长期呈胶着状态，故应清醒地看到未来地缘政治走势和世界会形成怎么样的新秩序，不会由美西方说了算，更不可能只由美国说了算，多极化的世界格局正在形成中。

认清中美力量对比虽发生变化但中美仍应长期和平共处。对中国甚至世界而言，中美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2024年中美GDP总额约占全球40%，中美贸易总额约占全球30%。自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交以来，迄今近50年，两国关系总体保持基本稳定。而今，多极化是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中美更多合作与文明互鉴，中美应智慧管控分歧，争取下一个50年及长期和平共处，避免跌入“修昔底德陷阱”。当然，应认清中美力量对比在发生变化。一方面，美国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当

下美国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但不限于：贸易长期高额逆差（下文将详述）；对内对外严重负债，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4月末美国未偿还国债余额36.21万亿美元；高昂的军费开支，2024年美国军费预算逼近9 000亿美元、约占全球军费总额40%[7]。另一方面，美国的实力依旧强大。例如，美国的GDP世界第一。IMF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的GDP约为18.94万亿美元，而美国的GDP为29.18万亿美元，中国GDP占美国GDP的64.91%，美国的GDP约占全球26.51%。再如，美国的贸易总额世界第一。WTO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货物贸易61 639.99亿美元，超过美国货物贸易7 395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一，但如加上服务贸易比较，则美国贸易总额为73 440.35亿美元（2024年美国服务贸易19 195.36亿美元，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略超过中国贸易总额1 235.36亿美元（2024年中国服务贸易10 565亿美元，数据来源于中国商务部数据中心）。再如，象征着财富的黄金储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世界黄金协会数据显示，2024年末，美国黄金储备8 133.5吨，中国黄金储备2 279.6吨，中国占美国28.03%，美国占全球22.46%。

2.突出周边经贸优先发展战略和扩大对外人文交流，增强中国式现代化的外部动能

构筑“八廊八柱”的中国周边经贸发展战略。贯彻2025年4月中央周边工作会议精神，聚焦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在周边经贸方面，可推动构筑“八廊八柱”的发展战略。“八廊”包括正在建设中的六大经济走廊：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又称“第二亚欧大陆桥”，指东起中国连云港西至荷兰鹿特丹的国际化铁路干线，全长10 900公里，辐射30多个国家和地区，著名的中欧班列就是依托陆桥、向陆而生，而“第一亚欧大陆桥”是指以俄罗斯东部的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到达荷兰的鹿特丹；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2013年中印共同发起）。“八廊”还建议包括：深化两岸经济走廊，以及谋划未来可能的中朝经济走廊。“八柱”包括突出与周边六个有影响力国家的关系，即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日（日本尚未加入“一带一路”）、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印（印度尚未加入“一带一路”，存在所谓的“龙象之争”）、中越（越南历史上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经济中心）、中菲（菲律宾为南海周边重要国家之一），以及凸显与中国内部的、曾被誉为“小龙”的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特殊经贸地位。

继续扩大更多的中国对外人文交流。一是欢迎更多的国外人士，包括那些对华有偏见的国外人士来中国实地交流，消除误解，增进了解。2024年12月17日，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公告，全面放宽优化过境免签政策，从当天开始，符合条件的54个国家人员，从中国过境前往第三国（地区）时，可以在中国停留的时间从72小时和144小时，统一延长到240小时，也就是10天[8]。自2025年6月1日至2026年5月31日，对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乌拉圭5国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试行免办签证入境[9]。此举有利于扩大对外交流，视情况今后还可以进一步放宽相关政策。二是继续加强对外宣传，让国外进一步“读懂中国”“读懂中共”。具体宣传内容包括：①中共和西方的党派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共的“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统一的、一致的”[10]，党性即人民性。②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热爱和平，反对战争，“奉行自卫防御核战略”[11]，但也不惧怕战争。这是因为“敢打方能言和”，“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12]。

四、国际贸易环境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与应对

（一）国际贸易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条件

贸易是买卖双方为了各自的需求而进行的交易活动，是市场经济的最基本行为。国际贸易是国家（地区）间进行货物和服务交换的活动。国际贸易环境体现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家（地区）间的国际分工关系和相互依赖条件。

国际贸易是中国追求财富价值、实现共同富裕、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基础条件。以支出法核算，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净出口构成了GDP的“三驾马车”之一，是一国（地区）财富价值的重要组成。中国自2001年加入WTO后，国际贸易得到了迅速发展，有力支持了经济综合实力（GDP）自2010年起跃居世界第二。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争取有利于中国的国际贸易环境。

（二）国际贸易环境正在深度影响着中国式现代化

1.美欧近年来认为中国“不公平贸易”

美国认为中国“不公平贸易”并挑起贸易战。2018年3月，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高喊“中国偷走了数百万美国工作岗位”，挑起中美贸易战。2024年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在大选竞选过程中，曾威胁将从四方面升级对华贸易制裁：一是取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PNTR），即最惠国待遇；二是对中国对美所有出口商品征收60%或以上关税；三是四年内停止对中国生产的必需品的进口；四是严厉打击中国商品通过第三国出口到美国。特朗普重返白宫后，虽尚没有完全兑现他的竞选诺言，但2025年2月1日对自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10%，3月4日以芬太尼等问题为由再次加征10%关税，4月2日对中国实施34%的“对等关税”、叠加此前税率后对华征收关税税率达54%，4月8日将对中国输美商品征收“对等关税”的税率由34%提高至84%、总关税达104%，4月10日对中国商品实际加征的总关税税率升至145%、其中部分税率为125%，4月15日声称中国输美商品现面临最高达245%的关税。5月10日至11日，中美经贸高层会谈取得实质性进展，美方取消了共计91%的加征关税，中方相应取消了91%的反制关税；美方暂停实施24%的“对等关税”，中方也相应暂停实施24%的反制关税，剩余10%的关税双方予以保留。

欧盟也认为中国“不公平贸易”并挑战贸易争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近年来经常声称，欧盟成员国不会一直容忍与中国“日益严重的贸易失衡”。2024年以来（截至2024年12月5日），欧盟已对中国发起了15起贸易救济调查[13]。2024年10月，欧盟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Battery Electric Vehicles，BEV）征收为期五年的最终反补贴税。

2.中美、中欧的贸易失衡状况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贸易顺差国。WTO最新数据（截至2025年5月）显示，2024年中国顺差额989 531百万美元，约0.99万亿美元，接近紧随其后的10位顺差国（地区）包括德国、俄罗斯、荷兰、爱尔兰、瑞士、沙特、中国台湾、挪威、阿联酋、意大利的总和（1 007 349百万美元），比紧随其后的9位顺差国（地区）的顺差额（948 096百万美元）略高。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计算，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额（361 152百万美元）占比约为36.50%。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贸易逆差国。二战后的初期，顺差是美国货物贸易收支常态。除1959年、1968年和1969年分别逆差6.01亿美元、12.87亿美元和9.80亿美元外，其余历年均为顺差。1971年后，逆差成为美国货物贸易收支新常态。除1975年顺差29.75亿美元之外，其余历年均为逆差[7]。WTO最新数据（截至2025年5月）显示，2024年美国逆差额1 294 139百万美元，约1.29万亿美元，比紧随其后的10位逆差国（地区）包括英国、印度、法国、土耳其、菲律宾、中国香港、西班牙、埃及、希腊、罗马尼亚的逆差总和（1 039 638百万美元）还要高。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计算，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额（319 075百万美元）占比约为24.66%。

贸易摩擦后的中美贸易动荡徘徊。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显示，自2000年以来，中美进出口贸易总体是稳中有升；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后，中美贸易受到影响，但仍在动态调整和徘徊中。2017、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中美货物贸易额分别为5 848亿美元、6 353亿美元、5 431亿美元、5 888亿美元、7 479亿美元、7 617亿美元、6 664亿美元、6 883亿美元，2018年起，环比分别增长8.64%、-14.51%、8.42%、27.02%、1.84%、-12.52%和3.59%。2021—2024年每年的中美货物贸易额超过中美贸易战始发的2018年和上一年2017年，表明中美货物贸易互补、有市场需求。以2024年为例，中国向美出口的商品包括第16类（机器、机械器具、电气设备及其零件；录音机及放声机、电视图像、声音的录制和重放设备及其零件）、第20类（杂项制品）、第11类（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等，中国自美进口商品包括第16类、第05类（矿产品）、第06类（化学工业及其相关工业的产品）等，属于正常的货物贸易往来。2024年10月WTO分析报告显示，墨西哥和越南成为中国对美国货物出口市场的重要替代者。在服务贸易方面，中美之间长期以来是美国顺差，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2000—2024年统计数据显示，美对华一直顺差，年平均顺差171.16亿美元，且总体呈曲线上升态势；2024年，美国出口中国546.12亿美元，美国自中国进口227.73亿美元，累计773.85亿美元，美国顺差318.39亿美元。其实，在服务贸易领域，中国还可以增加进口，以平衡总的贸易，但美国泛化安全概念，限制对华出口，尤其是在高科技行业。

欧盟对华贸易逆差由来已久。欧盟统计局数

据显示，2002年以来，欧盟对华货物贸易表现为持续逆差，且基本呈不断攀升状态。2005年逆差1069亿欧元，首次突破1000亿欧元；2021年逆差2490亿欧元，突破2000亿欧元，2022、2023、2024年逆差分别为3973、2970和3045亿欧元。另，OECD最新数据（截至2025年3月）显示，2010—2023年欧盟对华服务贸易一直呈顺差状态，最低年份为2010年顺差18亿美元，最高年份为2021年顺差268亿美元，年平均顺差为136亿美元。欧盟对华贸易长期逆差，有中欧产业分工、互补和贸易壁垒等长期积累的因素，包括中国“新三样”（太阳能电池、锂电池和电动汽车）的出口竞争优势，欧盟对华实施严苛的出口管制、服务贸易顺差提升受限，也有疫情、地缘政治等临时因素作用。

3.对贸易失衡问题的学理分析

贸易顺差不等于贸易最终收益。贸易收益的计算是个复杂的过程，价值增值理论和对贸易增加值的测算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贸易收益。对中国而言，贸易顺差主要是由货物贸易顺差造成的，支撑了中国GDP的增长，对制造业和就业有帮助，但换来了“绿票子”，变成了“美国国债”，潜伏着危机，突出表现在战略上支持了美国，同时面临美元和美国国债的信用危机。对美国而言，主要是由货物贸易逆差造成的，给美国带来的不利可能是影响了美国的制造业和就业人数，甚至影响所谓的“安全”，但美国凭借印制美元的优势、助力美国获得了他国包括中国的商品和服务。对欧盟而言，欧盟也是担心逆差影响欧洲产业竞争力和就业人数，但欧元的逐渐强势也助力欧元区增进财富。进一步分析，贸易与财富是相互关联的，国际货币因国际贸易而生。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促进了对外贸易，重商主义应运而生。早期的重商主义极端地认为财富仅限于金银货币，只允许金银货币流入，禁止流出，代表人物有英国的威廉斯•塔福（1554—1612）等；晚期的重商主义不禁止货币流出，强调净流入即可，即所谓的“贸易差额论”，代表人物有英国的托马斯•孟（1571—1641）等。如今的美元、欧元作为主权信用货币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历史上的超主权货币“金银”，给强势的主权信用货币竞相贬值带来了可趁之机，也给贸易收益和财富的计算带来了更多的复杂性。

贸易战加深人们对传统贸易理论怀疑。现有的国际贸易是基于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主要包括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和大卫•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主张市场分工与贸易自由化。之后的新贸易理论（如美国学者保罗•克鲁格曼的产业内贸易理论和美国学者雷蒙德•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新新国际贸易理论（如美国学者梅里兹提出的异质企业模型和美国学者安特拉斯提出的企业内生边界模型），仍脱胎于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从全球看，国际贸易是绝对平衡的，总供给恒等于总需求。国际贸易的相对平衡则是基于一国或一个区域来考虑，这涉及到资源配置范围和效率，资源配置范围越大、全社会配置效率越高。关于国际贸易失衡问题，被誉为“天才”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1883—1946）可能早就预料到今天的中美贸易战和中欧贸易冲突。在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会议上，被提出的“凯恩斯计划”相关内容包括：一是要求顺差国强制将盈余存入同盟账户和向逆差国提供透支（实质为贷款），以构造超主权中央银行的货币派生渠道，为全球经贸发展提供所需的充足的支付清算媒介。二是顺差国和逆差国共同承担国际收支失衡的调节机制。怀特主张不对称的调整，逆差国承担几乎全部的调整责任；凯恩斯主张对称的调整，顺差国和逆差国共同承担调整责任，即当成员国清算账户顺差或逆差超过其份额25%时被确定为收支不平衡，要对其超额部分收取管理费，并要求其采取相应的扩张或紧缩政策，超过份额的资金将在年底被没收作为公共储备基金以作为约束。调节方式上，怀特主张采取货币互换，即逆差国用本币换取所需其他国家的货币，本质上是以本币作为抵押获取外币贷款；而凯恩斯则允许逆差国直接申请透支或提存。笔者理解，这两种调节方式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游离在体制外自循环，后者在体制内监测下循环，而这个体制则指“世界中央银行”。众所周知，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怀特计划”为蓝本，“怀特计划”已经得到了验证，一方面其对“二战”后世界经济金融秩序的恢复与构建有贡献，另一方面也发现了试错所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没有经过实证的“凯恩斯计划”是否比“怀特计划”更完美，有待商榷。然而，当代接踵而至的贸易战，尤其是特朗普2.0时代推崇的“对等关税”新政，使得人们对传统的贸易理论产生了质疑，对构建包括贸易平衡在内的新商业文明产生了浓厚的

研究兴趣。

(三)努力减弱国际贸易环境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阻力

妥善应对来自美国的贸易战。政治家的竞选言论,不可全信。尽管如此,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坚持要和中国继续搞贸易对抗,如上所述,从特朗普的关税新政可见一斑。另外,特朗普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其他新政。例如:2025年3月10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针对中国通过了《与依赖外国对手电池脱钩法案》(H.R.1166),禁止美国国土安全部采购六家中国企业生产的电池,通过了《抵御中国盾牌法》(H.R.908),要求国土安全部成立专门工作组应对中国安全威胁。美国庞大的经常项目逆差特别是货物贸易逆差存在的根源是复杂的,与长期的"寅吃卯粮"、严重的对内对外负债、过度的军费开支、严格的技术出口管制、过分的美元信用透支以及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间的深层次矛盾等有关。美国贸易新政主张"对等关税",与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和非歧视原则相抵触,动摇了"二战"后由美国主导的国际贸易秩序的基石,破坏了多边贸易体制。美国无差别的"对等关税"对待贸易伙伴国,抑或增加美国国内通胀压力,影响到"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总之,美国贸易新政产生的效应以及未来的贸易政策走向何如,有待进一步观察。中方应持续做好妥善应对,包括针锋相对展开对美贸易斗争和诉诸WTO等。

妥善应对来自欧盟的贸易争端。欧盟或会加速应对与中国的"贸易失衡"。冯德莱恩2024年7月连任欧盟委员会主席,预计在其新的任期5年内,围绕中欧贸易平衡话题会在中欧之间"喋喋不休"。但欧盟贸易政策也存在不确定性,受地缘政治、内部分化、来自美国的关税战和自身的碳边界调整机制(CBAM)、数字单一市场战略等因素影响。为此,中国要有心理准备和应对策略,具体对策建议包括:支持欧盟战略自主、防止美欧联手共同制裁中国贸易;努力促进中欧技术贸易增长;借鉴吸收欧盟数字贸易、绿色贸易发展经验;努力化解中欧贸易摩擦,必要时针锋相对展开贸易斗争,甚至诉诸WTO等。需要说明的是,欧盟并不完全代表欧洲,欧盟有27个成员国(2013年7月1日,克罗地亚成为第27个成员国),而欧洲共有45个国家,中国应争取与更广泛的欧洲国家包括小国家加深贸易往来。

中国应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020年5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首提"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基于"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在国内外环境发生显著变化大背景下,推动中国经济平稳、可持续发展和开放型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从目前现状看,"三驾马车"中之一的"货物和服务贸易净出口"受到外部需求减弱的预期明显,需要进一步拉动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以促进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为此,建议扩大"国内大循环",让国内消费火起来,让国内创业者融资投资更便利。可研究进一步减少限制性消费措施,支持合法合规的公款消费、集团消费,发挥其"消费乘子"的功倍效能,以带动全社会消费。研究丰富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发展新三板和PE、VC市场,让国内真正的创业者、中小民营企业更加便捷地获得融资进而增加投资,同时也有利于应对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对"中概股"的可能打压。

中国应携手全球南方积极参与全球贸易治理,倡导"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之规则应是国际规则,而不是少数国家的国内规则。如,美国发起的对华贸易战,大多是基于美国本国法律。其主要依据以下条款:一是232调查,依据美国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对特定产品进口(如钢铝)是否威胁美国国家安全进行立案调查;二是337调查,根据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337节及相关修正案进行的调查,即知识产权调查;三是201调查,即产业形态技术调查,根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201—204节进行贸易调查,对产品进口增加是否对美国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作出裁定;四是301调查,所谓进行贸易打击的"核武器",其依据的301条款是指美国《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第1301—1310节的全部内容,其主要含义是保护美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权利,对其他被认为贸易做法"不合理""不公平"的国家进行报复,包括"一般301条款"(关于不公平措施)、"特别301条款"(关于知识产权)、"超级301条款"(关于贸易自由化)和具体配套措施;五是美国国会通过的特别法案。

中国应继续维护WTO权威,争取国际贸易规则话语权。一是提防美国对WTO持消极态度。特朗普视贸易逆差为美国的代价,对自由贸易持

怀疑态度。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屡次威胁要让美国退出WTO。拜登政府基本延续了上届政府的贸易政策倾向，依旧选择阻挠争端解决机制（Dispute Settlement Body，DSB）上诉机构新法官上任。预计美国利益至上的特朗普及其新一届政府直接退出WTO的可能性较小，因为美国与其他国家的FTA（自由贸易协定）数量相对较少，如果美国退出WTO，将不得不与所有国家重新谈判，这样代价太大。但值得警惕的是，截至2024年底，美国拖欠WTO会费2 570万美元[14]。二是关注WTO的贸易政策倾向。世贸组织现有166个成员，近年来WTO对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有所察觉。总干事伊维拉将于2025年9月1日开启第二个任期，2024年11月28日，伊维拉向世贸组织总理事会发表未来四年的工作设想和愿景时坦言，“我们看到了恐惧、民粹主义、保护主义，以及对我们长期以来珍视的体系和机构提出的质疑”。2024年12月2日，伊维拉出席由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研究院与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举办的第四届Next STEP全球会议时指出，中美大国之间的贸易虽然更受关注，但在全球贸易额中，中美双边贸易的占比其实少于3%（WTO数据显示，2024年，基于国际收支的货物和服务的世界贸易额达到31.5万亿美元）。换言之，其余国家规模虽小，但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才是全球贸易的大玩家”。三是中方维护WTO权威。2024年11月29日，中国商务部世贸司负责人在答记者问中表示，中方愿与伊维拉总干事一道，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将发展置于国际经贸议程中心地位，推进世贸组织必要改革，促进世贸组织规则与时俱进，增强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15]。

五、国际投资环境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与应对

（一）国际投资是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加速器”

国际投资是指资本的跨境流动，亦称“双向投资”，包括从国外吸收资金到国内的外商直接投资资金（FDI）和将国内资金投放到国外的境外直接投资（ODI）的两个方向、两个部分。

从经济功能和作用程度看，国际贸易是国际经济合作的基础，国际投资则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国际经济合作的杠杆。国际投资的主要功能在于推动资本的跨境直接流动，促进包括资金在内的资源在区域乃至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进而推动技术、管理和文化的传播以及科技创新能力的升级提高，增强国际经济联系和合作。国际投资对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杠杆效应，可预期、法治化、适合营商的国际投资环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加速器”。

（二）国际投资环境对中国式现代化影响不容忽视

1. 全球跨境直接投资普遍下降，中国利用外资下降更为明显

全球跨境直接投资普遍下降。联合国贸发会议最新公开（截至2025年3月）的《世界投资报告2024》显示，2023年，全球FDI规模为13 318.1亿美元，同比下降1.8%；ODI规模为15 505.8亿美元，同比下降1.5%。

中国利用外资下降更为明显。中国商务部最新公开的（截至2025年3月）《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4》显示，2023年实际利用外资1 632.5亿美元，同比下降13.7%，其中来源中国香港地区1 111.8亿美元、占比68.1%，来源于美国33.6亿美元、占比2.1%（而同期美国对外投资4 043.2亿美元、中国占比仅0.83%），来源于日本38.9亿美元、占比2.4%（而同期日本对外投资1 840.2亿美元、中国占比仅2.11%），来源于德国19.2亿美元、占比1.2%（而同期德国对外投资1 012.5亿美元、中国占比仅1.90%）。从2023年的数据看，如剔除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吸引外资形势更为堪忧。

2.美国通过“小院高墙”妨碍了中国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

美国通过经贸政策，限制与中国投资合作。2018年，墨西哥、加拿大与美国达成的《美墨加三国协议》中设置了毒丸条款，即“任何一方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议时，应允许其他各方在发出6个月的通知后终止本协议”，以此来孤立中国。2022年，美国推出“印太经济框架”（IPEF），并强调“IPEF独立于中国之外”。2023年，APEC旧金山会议期间，美国召集14个国家举行IPEF首次首脑会议。但特朗普对IPEF持不同政见，他在2023年11月18日一次讲话中，将IPEF称作“TPP二号”，“这比第一个（TPP）更糟糕，堪称用另一个旨在推动向亚洲外包的大规模全球主义怪物来摧毁农民和制造商。”2022年，美国推

出“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APEP），强化“近岸外包”、“近岸投资”，意在限制与中国投资合作。

美国泛化安全概念，尤在高科技投资领域限制与中国合作。特朗普2017年首次执政后，在高科技领域对华实行“有限封堵”。拜登执政期间，基本延续了特朗普的政策。2018年，美国针对“中国制造2025”和“军民融合”战略，出台了《2018出口管制改革法案》，增列了14类新兴和基础技术。2019年，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将华为及相关公司列入实体清单。2021年，美国出台《2021创新与科技法案》，由1个拨款方案和4个相互独立的法案构成，其中一个独立法案就是《应对中国挑战法案》。2022年，美国出台《2022芯片和科学法案》，其中设置了“中国护栏”条款，该条款规定，禁止获得联邦资金的公司在中国大幅增产先进制程芯片，期限为10年，违反禁令或未能修正违规状况的公司需要全额退还联邦补助款。2024年10月28日，离2024大选不足10天的时间里，美国财政部遵循拜登2023年签署的第14105号行政命令，出台《对华投资限制最终规则》（2025年1月2日起正式生效），旨在限制或禁止美国人（包括美国自然人、美国实体及其外国分支机构；自然人包括美国公民和绿卡持有者）及其控制的非美国实体在受关注国家（指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开展涉及受限制国家安全技术和产品，主要涉及半导体、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受限制交易。

3.欧盟对华推行“去风险化”，导致《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搁浅和投资审查升级

欧盟对华推行“去风险化”。2003年，中欧领导人共同决定建立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19年，欧盟推出对华三重定位——伙伴、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但近年来，欧盟较少提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更多从经济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的角度看待中国。2023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首次提出“去风险化”的对华政策概念，被西方政客普遍认同，替代了过去难听的说辞“对华脱钩”。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搁浅和投资审查升级。《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hina-EU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Investment，CAI）谈判始于2014年初。于2020年12月30日宣布如期完成谈判，其核心内容包括市场准入承诺、公平竞争规则、可持续发展与争端解决机制。但在欧盟内部反对势力和美方施压下，欧洲议会于2021年5月20日通过了冻结中欧CAI的议案。2023年10月欧盟委员会启动对中国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以来（截至2024年12月10日），欧盟对华动用限制性经贸措施超过40项[16]。新一届欧盟委员会愈发强调“经济安全”，计划进一步强化经贸工具箱，升级投资审查、出口管制等领域的限制性措施。

（三）努力增加国际投资环境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正能量

警惕强势的主权货币利用“双向投资”套利。如上所述，国际投资有助于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也体现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度。以中欧、美欧为例，从“双向投资”这一维度观察，数据显示，中欧经济依存度远不如美欧。到2024年，中欧相互投资存量是2 500亿美元，但美国和欧洲的投资存量超过3.7万亿美元，约是中国的15倍[8]。但是，在现有国际货币体系不够公平不够合理的前提下，存在强势的主权货币可能竞相贬值、输出货币的情形。为此，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可能需要继续执行资本项下的有条件管制，警惕强势的主权货币利用“双向投资”套利。

中国理应双向发力对待“双向投资”。中国一方面可以通过谈判，努力改善中美、中欧投资关系，营造良好的投资生态环境。2024年12月13日中美两国政府代表在北京换文签署了《关于修订和延长两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议定书》，将《中美科技合作协定》自2024年8月27日起延期5年。这一举动，表明中美投资合作同样有谈判余地。另一方面，中国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需要增强战略思维，注重绿色、可持续发展，进一步防范资金风险，努力提高全要素生产效率。

六、国际货币金融环境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与应对

（一）国际货币金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货币和金融属于虚拟经济范畴，是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国际货币是指在国际贸易投资等经济活动中被普遍接受、广泛使用的货币，金银等贵金属历史上曾是较为理想的国际货币。国际货币应当是超主权的货币，强势的主权

货币可以成为国际货币的补充，或替代超主权货币行使国际货币职能，如历史上与黄金挂钩的英镑、美元。“二战”后期的布雷顿森林会议确定了黄金和与黄金挂钩的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后来国际货币体系陆续处于变革和完善中，如今黄金、特别提款权（SDR）和SDR篮子货币（包括美元、欧元、英镑、日元、人民币）被公认为国际货币或正在行使国际货币的某些职能。国际金融的范畴较广，包括国际货币、国际结算、国际信贷、国际证券等内容。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国际货币金融的支持，良好的稳定的国际货币金融环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条件。

（二）国际货币金融环境正在影响着中国式现代化

1.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不公平不合理

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国际货币真正进入了无“锚”的信用货币时代。尽管IMF和世界各国也一直积极努力不断完善国际货币体系，但至少有三个重要的坎儿难以逾越。

一是缺乏对储备货币发行的硬约束机制。作为主要储备货币的美元是一国主权货币，其发行有其国内的“锚”目标，如通胀、就业、经济增长等货币政策目标，但这些目标是美联储基于美国利益，而非基于全球利益的最大化。其他的储备货币，如欧元、英镑、日元、人民币等，也遇到这一瓶颈。因此，这容易诱发全球流动性过剩。

二是缺乏对国际收支失衡的有效调节机制。以“怀特计划”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凯恩斯计划”相比，本就对国际收支失衡缺乏硬约束力。后来于1976年达成的牙买加体系，对汇率制度、汇兑管理、国际收支状况等并未作出强制性的限定，抑或当时的决策者们也难以做出决策，而寄希望于浮动汇率的自动调节功能。因此，这容易导致全球国际收支失衡。

三是缺乏治理国际货币体系的组织保障机制。IMF和世界银行虽说是全球性的两大国际金融组织，是布雷顿森林会议的重要产物和成果，但事实上美欧有相对控制权。IMF的投票权实行份额管理，规定任何重大政策决定须获得85%投票权的支持，而美国拥有17.69%的IMF份额，故具有一票否决权，且基于所谓的非正式“绅士协议”，IMF总裁都来自欧洲。世界银行的宗旨是向成员国提供贷款和投资，推进国际贸易均衡发展，但也是基于所谓的非正式“绅士协议”，世界银行行长由美国总统提名，所有世行行长都是美国人。因此，这种组织保障制度显失公允，容易导致货币金融治理赤字。

由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一些体制性障碍和弊端，导致了出现全球流动性过剩、全球国际收支失衡严重等货币金融经济的乱象。

2.特朗普新政影响美元及国际货币体系构建

特朗普期望美联储更能听命于美国政府。美联储具有独立性，但通过历史事件观察，在关键问题上，美联储最终都是屈服于美国总统和政府的意志。特朗普期望进一步削减美联储的独立性。

特朗普支持数字加密货币。特朗普改变了拜登政府之前对加密货币“并非不友好”（not-unfriendly）的柔化立场。拜登政府原先持有的这一立场，主要顾虑在于担心数字货币对美元国际地位的冲击。显然，特朗普坦然接受加密货币的威胁与共存。

特朗普新政或对美元及国际货币体系构建形成颠覆性影响。特朗普新任期内发动的贸易战，或延伸到科技、金融、教育领域，或加速世界对美元承担国际主要储备货币的“市场出清”。2024年11月，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威胁金砖国家要放弃用其他货币取代美元的计划，否则将对其征收“100%的关税”[17]。2024年12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回应，国际社会应该允许多个币种同生并存，使用金砖国家自己的未来货币并不代表禁止使用美元。普京此前也曾表示，并不是他们拒绝使用美元，但如果某些国家不让他们使用美元，他们被迫寻找替代品[18]。笔者预言，特朗普有可能是继罗斯福（1944年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尼克松（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但美元国际货币强势地位尚存）之后的第三任对美元影响巨大的总统。如果在特朗普新的任期内，美国彻底“解套”美元，即让美元彻底回归到主权货币之本位（强势的主权货币可以作为超主权货币的补充与超主权货币共存），有利有弊。从短期看，对美国是弊大于利，但从长期看，有利于美国和世界。其关键是需要美国及其盟友、伙伴配合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美国国内出现了对美元信任危机的迹象。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在2024年12月2日的报告中指出，越来越多的美国州开始宣布黄金和

白银成为与美元并驾齐驱的合法货币，用于商品交易、偿还债务和税款，以应对美元购买力下降和通胀风险。路易斯安那州在2024年12月2日签署的SB531法案中，赋予了黄金和白银在该州的独立法定货币地位，并禁止美国财政部扣押和没收黄金。

3.IMF和BIS的有益探索有助于优化国际货币体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积极探索数字货币及其国际化。2024年11月，IMF在官网上发布了有关央行数字货币（CBDC）设计和运营模式、数据使用与隐私保护以及中央银行探索CBDC跨境使用等系列工作论文。IMF专家认为，在金融领域，信任至关重要，尤其是对于数字货币而言。探讨了开发具有网络弹性的CBDC生态系统所需的要素和挑战，包括分布式账本、数字钱包、智能合约和支持离线功能的技术变体等新技术（IMF Note/007，2023）。IMF专家认为，网络安全通常遵循三个核心原则，保密性、完整性、可用性。据报道，超过80%的网络攻击归因于人为因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EMDE）在确保CBDC生态系统安全方面可能面临更严峻的挑战[9-10]。

国际清算银行积极探索数字货币及其国际化。国际清算银行（BIS）年度经济报告（2023）提出了未来货币体系的蓝图，可利用代币化的变革潜力来改进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结构并开辟新的可能性。这个蓝图勾勒出了一个新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即统一账本，由此将央行数字货币（CBDC）、代币化存款和其他代币化索赔的金融和实物资产整合在一起，但强调需要从个体实验转向联合创新。BIS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86家受访中央银行中有94%正在探索CBDC，而且，中央银行们在未来六年内发行批发型CBDC的可能性大于零售型[11-12]。

（三）努力推动国际货币金融环境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和有利于中国式现代化方向发展

数字货币时代的到来和地缘政治的影响等，加速了国际货币体系变革。中国需要理性调整货币金融策略，努力推动国际货币金融环境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和有利于中国式现代化方向发展。具体建议包括：

1.从容应对人民币汇率的波动。稳定人民币汇率不应仅盯着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变化，更应关注人民币汇率指数，包括CFETS（中国外汇交易中心）、BIS货币篮子和SDR货币篮子人民币汇率指数的变动。

2.持续关注美元信用。警惕美国可能出现的债务危机，战略持有美国国债（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2月，中国持有7843亿美元、位居第二，而日本持有11259亿美元），多元化投资中国的外汇储备。截至2024年末，美国国债超过36万亿美元，占其GDP的比重超过120%。

3.持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在“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上，适度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明确人民币国际化不是为了替代美元、欧元，而是为了配合中国的企业走出去，满足中国对外贸易、投资及经济合作的需要。

4.持续推进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难题。借鉴美国资本市场发展经验，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让真正的创业者和中小民营企业便利融资与投资。

5.推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和有利于中国式现代化方向发展。一是探索提升SDR的国际货币功能，形成以SDR为核心的国际信用货币体系[13]。探索SDR的“价值锚”，可挂钩一揽子商品。SDR的“发行锚”，可借鉴“凯恩斯计划”锚定全球贸易总量。二是探索国际清算银行行使全球中央银行的支付清算职能。探索基于各国既有的CBDC科技成果和应用区块链、量子计算等技术，由BIS牵头，在IMF支持和各国央行通力合作的基础上，开发全新的更为安全、更有效率、更加经济的可追溯的全球支付清算系统。三是探索完善国际货币规则制定、争端解决与组织保障机制。维护IMF、世界银行和国际清算银行的国际货币组织权威，改革和完善这三大机构的内部治理和投票决策机制，摊薄个别国家的份额，防止个别国家操纵国际金融组织，让这些国际金融组织更能广泛代表全球的共同利益。

七、结语

中国式现代化是个复杂的开放的巨系统工程[14]，本文从自然资源、地缘政治、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货币金融五个层面来观察中国式现代化外部环境未必科学合理，也未必能窥清全貌，但仍期望对正确认识中国外部环境尤其是经济外部环境有所贡献。中国从事中国式现代化，置

于世界大环境乃至宇宙之中。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世界大环境中，中国很难做到“独善其身”。中国需要理性看待外部环境，关注外部环境，适应外部环境，正向影响外部环境。

当前及未来三十年是中国式现代化重要窗口期。来自自然条件、地缘政治因素的干扰，以及来自美西方可能有针对性地对中国贸易、投资、金融、科技等领域的打压，均会影响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为此，中国需要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系统观念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为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注释：

(1)《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37页。
(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0页。
(3)环球网2024年12月24日报道（俄媒报道，当地时间12月19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年度记者会）。
(4)外交部网站，2023年6月2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
(5)在1992年“集安条约”基础上于2002年改制，截至2025年5月有6个成员国。
(6)参考消息网2024年4月10日报道（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2024年4月9日报道）。
(7)环球网2024年3月14日报道。
(8)中国经济网2024年12月22日报道。
(9)外交部发言人2025年5月15日例行记者会宣布。
(10)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11)央视新闻客户端2024年7月30日报道（外交部回应美日强化核威慑合作）。
(12)新华网2020年7月31日报道（习近平：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1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024年12月5日回应中欧贸易摩擦问题。
(14)2025年3月29日央广网《美国拖欠WTO会费2570万美元》。
(15)2024年11月29日商务部世贸司负责人答记者问。
(16)环球网2024年12月10日报道（外交部发言人例行记者会）。
(17)光明网2024年12月1日报道（特朗普突然发文威胁）。
(18)凤凰网2024年12月5日报道（普京回应特朗普威胁）。

参考文献：

[1]习近平.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N]. 人民日报, 2020-11-4.
[2]姜赛平, 刘天科, 陈永朋. 基于学科分类的资源经济学与环境经济学及生态经济学比较分析[J]. 自然资源情报, 2024(5): 58-64.
[3]周繁, 李玮晔, 郑祐, 等. 自然资源概念界定及其与国土调查的关联探讨[J/OL].中国国土资源经济, 1-17 [2025-3-2]. https://doi.org/10.19676/j.cnki.1672-6995.001161.
[4]徐德顺. “去风险化”下全球关键矿产产供链的重塑[J]. 当代世界, 2023(12): 36-41.
[5]熊琛然, 王礼茂, 屈秋实, 等. 地缘政治环境中的情景分析: 中国的视角[J]. 世界地理研究, 2019, 28(3): 1-10.
[6]徐德顺. 世界是不平的——基于当代国际经贸与金融热点问题思考[M]. 北京: 中国商务出版社, 2023.
[7]梅新育. 中美经贸争端的回顾与启示[N]. 北京: 光明日报, 2018-8-1(12).
[8]陈文玲. 世界地缘格局重塑与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性特征[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4(20): 75-93.
[9]Bharath A, Paduraru A, Gaidosch T. Cyber Resilience of the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Ecosystem. IMF, NOTE/2024/3. [EB/OL]. (2024-8-27) [2024-12-26].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fintech- notes/Issues/2024/08/27/Cyber-Resilience-of-the-Central-Bank-Digital-Currency-Ecosystem-554090.
[10]Tourpe H, Lannquist A, Soderberg G. A Guide to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Product Development 5P Methodology an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MF, NOTE/2023/007 [EB/OL]. (2023-9-8) [2024-12-26].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fintech- notes/Issues/2023/09/08/A-Guide-to-Central-Bank-Digital-Currency-Product-Development-538496.
[11]BIS. Blueprint for the Future Monetary System: Improving the Old, Enabling the New [R/OL]. (2023-06-20) [2024-12-6].https://www.bis.org/publ/arpdf/ar2023e3.htm.
[12]Iorio A D, Kosse A, Mattei I. Embracing Diversity, Advancing Together – Results of the 2023, BIS Survey on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ies and Crypto[EB/OL]. (2024-6-14) [2024-12-26]. https://www.bis.org/publ/bppdf/bispap147.htm.
[13]徐德顺. 告别动荡，国际货币体系当求新生[N]. 北京: 国际商报, 2024-03-7(4).
[14]徐德顺. 复杂经济学: 复杂性科学在经济系统中应用[M]. 北京: 中国商务出版社, 2024.

（下转第66页）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Certification and Accreditation between China and RCEP Member States: Current Status, 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SUN Ying, FANG Minhui, ZHENG Suli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China Jil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18, China)

Abstract: RCEP explicitly advocates that unnecessary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should be reduced in conformity assessment procedures, and encourages all parties to strengthen cooperation in conformity assessment procedures. After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status quo of certification and accreditation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RCEP member states,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still cooperation and docking problems between China and RCEP member states, such 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certification and accreditation countries, lack of regional dialogue and consultation mechanisms, and barriers to information exchange and interoperability. To deepe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certification and accreditation with RCEP member states, the study proposes adopting differentiated mutual recognition models, prioritizing key areas for mutual recognition, and promoting market-driven innovative practices. These measures aim to enhance alignment and collaboration, ultimately facilitating smoother trade relations within the RCEP framework.

Keywords: RCEP; certification and accreditation; mutual recogniti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责任编辑：刘睿智）

（上接第 17 页）

Rational Analysis and Strategic Choices for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XU Deshun
(Chines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Ministry of Commerce, Beijing 100710, China)

Abstract: 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an open and comprehensive systemic project, situated within the global environment and even the broader universe, influenced by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feedback from external factors in the natur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China, on the one hand, must adapt to the complex external environment, seize opportunities, and develop itself, and on the other han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and lead global governance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broadest national interests, including China. Based on the importance of influencing factors, this paper conducts a rational analysis of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from five dimensions: natural resources, geopolitics, international trad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ystems. Corresponding strategic recommendations are proposed, including: reducing the negative impact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on China's economy and enhancing strategic autonomy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critical minerals; emphasizing regional security and stability while expanding cultural exchanges with foreign countries; calmly addressing alleged "unfair trade" by the U.S. and Europe and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based on "dual circulation"; improving Sino-U.S. and Sino-European investment relations while enhancing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 outbound investments; and rationally adjusting China's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trategies to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a fairer, more equitable, and favorabl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ystem that supports Chinese modernization.

Keywords: Chinese modernization; external environment; rational analysis; strategic choices

（责任编辑：丁晓鸿）